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拼凑的裁缝》的激进艺术

“Language is the Garment of Thought”: The Radical Art of *Sartor Resartus*

王松林 (Wang Songlin)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卡莱尔《拼凑的裁缝》激进的创作艺术及其蕴含的文化批评思想。论文认为，《拼凑的裁缝》文类的杂糅性背后埋伏着丰富的互文信息，更重要的是，在作品的互文性中暗含了卡莱尔对其所处的“机械时代”的深刻批评。《拼凑的裁缝》极富艺术自觉性，这主要表现在作品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的原创性上。卡莱尔试图从语言层面对陈腐的传统思想进行革命，相信“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这一理念是其激进的艺术实践的基础。如果不能领略作品的互文性特征以及卡莱尔关于语言与思想之间内在关系的看法，就难于准确全面地理解《拼凑的裁缝》的价值，也难于准确把握该作品反映的卡莱尔文化批评思想的锋芒。

关键词：卡莱尔；《拼凑的裁缝》；互文性；语言与思想

作者简介：王松林，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 19 世纪英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本文受到宁波大学王宽城幸福基金资助，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卡莱尔文化批评思想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1B WW 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Language is the Garment of Thought”: the Radical Art of *Sartor Resartus*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omas Carlyle’s radical art in writing *Sartor Resartus* and his cultural criticism as embodied in it. It finds that as a mixture of multiple literary genres *Sartor Resartus* is encoded with rich information of intertextuality, which in a very important way expresses Carlyle’s profound criticism on the “Mechanical Age.” *Sartor Resartus* is a work full of artistic self-consciousness, which is evident in its stylistic originality. Believing “language is the garment of thought,” Carlyle intends to revolutionize the staleness of conventional thoughts from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This idea is the foundation of his radical practice in writing. Any ignorance of the intertextuality in *Sartor Resartus* and of Carlyle’s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ought might lead to an in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Sartor Resartus* and therefore a failure

to appreciate its artistic value and its sting of cultural criticism.

Keywords: Thomas Carlyle; *Sartor Resartus*; intertextuality; language and thought

Author: Wang Songlin, PH.D. , Professor of 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19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his paper, sponsored by K.C.Wong Magna Fund in Ningbo University, is par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gram “A Study on Thomas Carlyle’s Cultural Criticism and its Influence” [Program No:11BWW005] (Email: wangsonglin@nbu.edu.cn).

引言

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堪与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相媲美。麦克斯温尼认为，如果说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是18世纪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标志，那么，《拼凑的裁缝》则可视作“浪漫主义向维多利亚时期过渡的标志”（K.McSweeney & P. Sabor vii.）。但是，无论在题材还是风格上，《拼凑的裁缝》都有别于浪漫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卡莱尔于1831年开始创作《拼凑的裁缝》，1832年完稿，然后带着书稿去伦敦试图寻找出版商，但由于《拼凑的裁缝》风格的标新立异和写作语言的艰涩，卡莱尔在伦敦遭遇了冷遇，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这样一部奇怪的书。1833年，他只好在《弗雷泽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拼凑的裁缝》，小说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关注。但是，爱默生独具慧眼，在他的推荐下，《拼凑的裁缝》于1836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连卡莱尔本人也没料到的是，这本书竟然影响到了美国19世纪文学的一大批文学家，如艾伦·坡、惠特曼、麦尔维尔，当然还有先验主义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等。可以说，《拼凑的裁缝》推动了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复兴，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1837年，卡莱尔发表了《法国革命》，一举轰动英国文坛，此时的英国出版界才发现《拼凑的裁缝》的独创之处。1838年，《拼凑的裁缝》终于以书的形式在英国出版。

然而，无论是以当时的标准还是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我们都很难界定《拼凑的裁缝》是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文类完全不同，既不注重情节也缺乏人物形象的塑造，且写作语言晦涩难懂，叙事手法更是迂回曲折。A·L·勒·凯内认为，“《拼凑的裁缝》是一部离奇的浪漫主义的杰作，人们很难将它归入哪一类文学作品，也很难对它做出简要的概括”（凯内36）。威廉·亨利·赫德森（W. H. Hudson）却认为，“《拼凑的裁缝》是现代文献中最有生命力的、意味深长的著作；在结构和形式上，也最具原创性，表现出作家的勇气”（赫德森1）。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拼凑的裁缝》是一部带有浓重自传色彩的哲理小说”（徐晓雯86），理由是这

本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即“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Sartor Resartus: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Herr Teufeldrockh*）；也有评家认为这部作品就形式而言是一部小说，因为这本书毕竟是虚构的叙事，以“框架叙事”的形式向读者呈现故事，作者把讲故事喻为拼贴布料以剪裁衣裳，“裁缝就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做拼凑工作的就是卡莱尔，即书中的英国编辑”（赫德森2）。此书国内的另一译本将书名意译为《衣裳哲学》也有道理，因为书中的德国教授以衣裳为象征，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堪称为哲学著作。难怪赫德森在《拼凑的裁缝》的导言中开篇就指出：“我们很难把它归类：因为它既不是哲学论著，也不是自传，又不是小说。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所有这三者的结合”（赫德森1）。

可是，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的讨论只是单纯地停留在《拼凑的裁缝》的文类特征的归属问题上，似乎并不能抓住理解作品的要领，也不能洞悉作者深刻的文化批评思想。我们发现，在《拼凑的裁缝》文类的杂糅性背后还埋伏着丰富的互文性信息，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互文性及其激进的叙事艺术背后蕴含了作者对其所处的“机械时代”的深刻批评。应该说，如果不能领略小说的互文性特征以及小说激进的叙事艺术就难于准确全面地理解《拼凑的裁缝》的原创性，也难于全面把握卡莱尔深刻的文化批评思想。

一、《拼凑的裁缝》的互文性特征

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由20世纪回溯过往的创作，就不难发现，《拼凑的裁缝》是一部具有超前的高度自觉意识的虚构作品。不过，这部挑战小说写作传统的作品仍然保留了18世纪英国那些别具一格的小说家的风格，并在主题上与之形成强烈互文关系，其中最为明显的恐怕是18世纪的两位讽刺大师：斯威夫特（J. Swift, 1667-1745）和斯特恩（L. Sterne, 1713-1768）。

《拼凑的裁缝》受斯威夫特的影响十分明显。斯威夫特早期的讽刺小说《木桶的故事》（1704）对当时的宗教制度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为《木桶的故事》的辩解”一文中，斯威夫特特别说明他“决计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针对宗教和学术“写一篇有益且有趣的讽刺作品”（斯威夫特5）。《木桶的故事》以“书商”的口吻向读者介绍“他意外得来的这份文稿”（23-24），“书商”对文稿的性质不时地给予品论且与读者保持对话关系。这一叙述方式不禁让人想起卡莱尔让一位编辑作为叙述者来整理并讲述托尔夫斯德吕克的故事。尤为重要的是，《拼凑的裁缝》直接借用了斯威夫特小说中的“衣服”这一讽喻。《木桶的故事》的第二节一开始就讲了一个与“衣服”相关的寓言式的故事：临终的父亲为三胞胎儿子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每人一件新衣服，父亲死后三个儿子各自来到首都历险，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宗教理念。三个儿子彼得、马丁和杰克分别代表了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会和新教中不信奉国

教的人。斯威夫特在故事中赋予这件“衣服”宗教色彩（《旧约·申命记》第8章第4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木桶的故事》的第二节将宇宙形象地比作是“一套大衣服，裹住了一切”，并将人类自身喻为“一件小型的衣服”，而宗教却是“是一件斗篷”，“自爱是一件紧身長外衣”，“虚荣是一件衬衫”（57-58）。

《拼凑的裁缝》中有关衣裳哲学的话题显然深受斯威夫特的启发。“衣服”同样被赋予象征色彩和宗教内涵。在作品的第三部分第十一章（“裁缝”），作者通过托尔夫斯德吕克之口明确提到了斯威夫特的“衣裳哲学”。托尔夫斯德吕克对斯威夫特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断言：“斯威夫特以其天才敏锐的预言暗示的信条将大白于天下：裁缝不仅是人，而且是某种创造者或圣人”（270）。在《拼凑的裁缝》的引子部分，作者思考了人的本质问题，针对科学家认为人无非是“着装的动物”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所有的推测中，他们[科学家]都认为人是着装的动物。而人从本性上来说是裸体动物。只有在某种情形下，人才会把自己有目的、有策略地把自己隐藏在衣服里”（5）。这一观点与斯威夫特在《木桶的故事》中对所谓人是着装的“理性的动物”的讥讽暗中形成互文：

世人称作衣冠不整的那些生物，按实在说法，是最高雅的一类动物，或者往更高一层说，是理性的动物，是人。……真个的，这些被粗俗地称作一套套衣服的动物，按照某些组成部分来看，接受了不同的名称。……如果某些貂皮和狐皮放在某一个位置上，我们就称呼它们为法官，因此把上等细麻布和黑段子合适地连接在一起，我们就称之为位主教。（58）

在《拼凑的裁缝》中，叙述者不惜花大量篇幅介绍托尔夫斯德吕克的“衣裳哲学”，第一部分结尾时作者让编辑通过托尔夫斯德吕克之口总结了“衣裳哲学”的内涵：

所有可见之物都是象征；人们看得到的事物并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的；物质只在精神上存在，代表某种观点并使它形诸具体……衣服，上至国王的披风下至其他，都是象征性的……语言被称为思想的外衣，但毋宁说，语言是思想的内外衣、躯体。（70）

在这里，卡莱尔对斯威夫特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指出“整个外部世界和它握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服装；所有科学的本质都处在服装哲学中”（卡莱尔 71）。然而，对于“衣服”象征的宗教的看法，《拼凑的裁缝》与《木桶的故事》存有不同之处。《木桶的故事》的叙述者站在温和的英国国教会

的立场，认为他们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合身，与此相对的是，天主教的衣服显得过分华丽耀眼，而那些不信新教的人（如加尔文教徒）的衣服又有一种狂热的朴素”（Kerry Mcweeney and Peter Sabo xv）。然而，对年轻而激进的卡莱尔来说，象征宗教和社会机制的“衣服”应该彻底焚烧，最终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详见《拼凑的裁缝》第三部第五章“凤凰”）。

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1726）也是卡莱尔十分喜欢的作品，其中的“飞岛国游记”（Laputa）是作者对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滑稽可笑的科学家的挖苦或者说是科学主义的批评。飞岛国的科学家们整天沉浸在荒诞不经的思考中：如何“黄瓜里提取出阳光来”，“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这令人联想到卡莱尔笔下的主人公托尔夫斯德吕克在德语中的意思是“魔鬼的粪便”）还有如何“做把冰烧成火药”（160）。更有甚者，一位“万能教授”发明了一台机器，试图“用机械的方法来改善思辨知识”（160）。卡莱尔把托尔夫斯德吕克设计成为“万能”教授“Professor of General Things”或许就受此启发。可见，两位作家对机械主义的批评一脉相承。斯威夫特对科学家的讥讽表达了他对现代科技工具理性的忧虑。值得一提的是，飞岛国的仆人们总喜欢拿着手杖，“手杖的一端缚着一个吹得膨胀起来的气囊，像个连枷。后来我才听说里面装着少量的干豌豆或者小石块。他们时常用这些气囊拍打站在他们跟前的人们的嘴和耳朵”（139）。格利佛实在想不出这种荒唐的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139）。同样，在《拼凑的裁缝》第一部的第十章（“纯粹理性”），卡莱尔表达了对科学主义的批评，正如编辑在评论托尔夫斯德吕克对科学的看法时所言，托尔夫斯德吕克对科学没有多少好感，因为“科学的进步，是要摧毁好奇心的”（65）。就在这一章的开端，卡莱尔暗中借用《格利佛游记》中“装有干豆的气囊”这一滑稽的表述，通过托尔夫斯德吕克之口挖苦“文明生活”的“种种庄重仪式和繁琐程序中，没有别的，只有数不清的破碎布料、赶火鸡耳朵竹竿和‘装有干豆的气囊’”（“Bladders with dried Peas”）（61）。“文明”与“科学”的字眼在卡莱尔笔下与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构成明显的互文关系。

《拼凑的裁缝》第三部第四章的叙事口吻还与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构成明显的互文关系。《一个温和的建议》极尽反讽之能事，就爱尔兰的贫困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向英国女王提出“温和的建议”：可将婴儿炸了吃、炖了吃、烤了吃，或可剥其皮以外销。斯威夫特不动声色却又尖刻辛辣地对英国统治者残酷剥削爱尔兰人民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样，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就人口问题对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进行了批评，小说中的那位霍夫拉斯·霍尔石瑞克写了一本名为《缩减人口协会》的小册子，这不禁让读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马尔萨斯的化身。托尔夫斯德吕克（或者说卡莱尔）模拟了斯威夫特式的反讽语气，也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提出根治人口过剩的最好办法就是规定三天作为狩猎的日子去

杀死那些乞丐

在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也许每年用三天的时间，就足以射杀一年中积累起来的强壮的乞丐。让政府考虑这一点吧。使用这种方法，所需军费极少，不仅如此，本钱还可以从尸首上赚回来。把尸体的肉先腌好，再用桶装起来，你不就可以把这当作食物吗？即便不给陆军和海军，那也可以慷慨地提供给济贫院以及其他什么地方瘦弱不堪的贫民，这可是件开明的慈善事业，不担心他们作恶了，难道他们看不到活着的好处吗？（214）

从以上辛辣反讽的口气中可见卡莱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等现象的极度不满，这构成了他的激进的社会批评思想的基础。《拼凑的裁缝》一书表达的这一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后来构成了《过去与现在》一书的主题之一，并为他若干年后向世人发出警世预言定下了基调。

劳伦斯·斯特恩是卡莱尔极为欣赏的另一位讽刺大家。1827年，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上撰文称斯特恩是“最优秀的，如果不是最有力的”幽默讽刺大家（Carlyle, *Works*, xxvi 17）。《拼凑的裁缝》在《弗雷泽杂志》上连载之前，卡莱尔曾考虑给小说取名为《衣裳哲学，或托尔夫斯德吕克的生平与见解》（*Thoughts on Clothes, or Life and Opinions of Herr. Teulfelsdrockh D.U.J*），这个书名显然是对《项狄传》的全名《绅士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1760-7*）的滑稽模仿。我们知道，在叙述方法上，《项狄传》时空混乱错位的叙事模式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超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斯特恩本人非常喜欢斯威夫特、塞万提斯和拉伯雷，有人甚至将他成为“英国的拉伯雷”（沃克 4）。在《项狄传》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塞万提斯的影子，小说的人物塑造就模仿了《堂吉诃德》式的喜剧手法，甚至他笔下的“约里克牧师”就与堂吉诃德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歌德这样评价斯特恩：“约里克·斯特恩是迄今文学上产生过影响的那种最优秀的风趣典型。无论谁读了他的作品都会顿觉自己超脱了时间琐碎的烦恼”（转引自沃克 51）。沃克指出，斯特恩本人的博览群书在《项狄传》中那位博学的编辑那里尽显出来，不过他认为，斯特恩的“博学”十之八九都是“从编撰者那里借来的二手材料……更确切地说，斯特恩有一个剪贴簿式的头脑”（沃克 15）。这一评论令我们想到《拼凑的裁缝》那位同样具有“剪贴簿式的头脑”的编辑（或曰卡莱尔的传声筒，有时也代表读者），而主人公托尔夫斯德吕克的“博学”也有斯特恩的影子。更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恩在《项狄传》中提到了考古学家兼作家阿尔伯图斯·鲁本斯的《论古人服饰》一书，该书就衣服的种类和起源做了考究，得出类似“衣裳哲学”的结论：“有钱有地位的人用衣服的细白程度显示自己与

众不同”（452）。斯特恩对语言、衣裳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有过一番机智的比喻，他用“神秘的斗篷”来描述那些装腔作势的、一本正经的人的华丽言辞，讽刺那些“堂皇晦涩的词语”“只不过是严肃正经披在身上来掩盖自己缺陷的故作神秘的斗篷”（沃克 52-53）。

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卡莱尔对斯特恩的滑稽模仿都是明显的。在《拼凑的裁缝》的第一部第九章（“裸体主义”）的结尾，托尔夫斯德吕克就引用了一位名为“约里克·斯特恩”的话嘲笑人们不过是一只“被缠着红破布的棍子赶到市场去的火鸡”（60）。但是，《项狄传》最吸引卡莱尔之处是其独特的叙述风格：除了特别的叙述方式之外，书中的排版和标点也打破常规，到处是斜体字和黑体字，有的段落全部是大写字母，而有些段落全部是小写字母，甚至将纸张涂黑或留有空白任凭读者去想象，此外，像括号、破折号、星号、手语符号等也比比皆是；法语、希腊语、拉丁语、献辞、法律文本、布道、双关语、滑稽模仿、插科打诨等交替出呈现，尽显作者的智慧与才华。不难发现，《拼凑的裁缝》的叙述方式与《项狄传》有诸多相近之处：有成长小说和传记文学的风格；叙事语气幽默而又充满讽刺；有拉伯雷或塞万提斯式的机智和学识；新词迭出炫耀作者的语言天赋；玩弄文字和修辞技巧，极具喜剧效果。正如哈罗德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卡莱尔的思想受到了德国思想家的影响的话，那么他在创作手法和形式上主要受到了“包括斯特恩在内的早期的英国小说实验主义者的影响”（Harrold 6）。

《拼凑的裁缝》集自传、哲学、虚构为一体，这一文类上的杂糅性决定了它风格的独创性。但是，在这一极具原创性的风格背后暗中编织了一张跨越时空的文本大网，只有仔细揣摩小说与英国文学和历史传统形成互文关系和跨时空对话并领悟其中暗藏的社会批判的锋机，才能深刻理解卡莱尔良苦用心的激进艺术。

二、《拼凑的裁缝》：“语言是思想的外衣”

在《拼凑的裁缝》第一部第十一章中，卡莱尔用“语言是思想的外衣”（Language is called the Garment of Thought）这句话来概括他的“衣裳哲学”：“任何感觉到存在的东西，任何灵魂到灵魂的代表，就是衣服，就是服装……整个外部世界和它握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服装；所有科学的本质都处在服装哲学之中”（卡莱尔 71）。“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借自英国 18 世纪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在评论 17 世纪诗人考利（Abraham Cowley）的文笔时说过一句名言，约翰逊博士如是说：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即便是风度翩翩的高贵之士或是举止得体的优雅之士，若是穿上一件手工粗糙的外衣，也会有失身份或黯然失色。故而，如果语言低俗、平庸、琐碎，口出粗野，污浊不堪，哪怕最壮美的情感

也将失去其感染力，最杰出的思想也将失去华丽的光泽。(Johnson 48)

约翰逊是卡莱尔最喜欢的英国作家之一，像约翰逊一样，卡莱尔对写作语言的风格与思想的关联深表关切。如果说，“衣服”只是代表了世界的表象，或者说语言如同衣裳一样是人们感知的外在形式，那么卡莱尔的叙事语言风格及其表达的思想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呢？或者说，《拼凑的裁缝》如何在语言风格上对传统的小说语言发出了挑战？这个问题是理解《拼凑的裁缝》的关键之一。

作为卡莱尔唯一一部完成了的虚构文学作品，《拼凑的裁缝》不仅在人物塑造上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的个性、心理、外表、行为等的细腻逼真的刻画，而且在结构形式上，小说也摆脱了传统小说情节结构的羁绊。作品很难说有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情节设计和逻辑构思，缺乏细节的逼真性，也不像现实主义小说那样追求对社会风貌的如实描摹。支配作品叙事过程的是富有哲思的主题即衣裳哲学，而表现这一主题又是通过充满象征意味和富有激情的语言风格的运用来实现的。譬如，读者对布鲁敏的碎片化的了解大多来自“编辑”转述的托尔夫斯德吕克对她的言辞华丽的赞美。托尔夫斯德吕克对布鲁敏的赞美之辞充满想象力，富有青春的活力和激情：

最美好的布鲁敏！即便是一颗星星，她也具备所有的火和湿湿的柔软，她正是光线的化身！他难道能克制自己不再怕犯哪怕是小错，不再“任性”了？对他来说，她难道不正是晨星吗？她的出现难道没带着天国的气息？在黎明的呼吸中，风神的弦琴，奥罗拉粉红色的手指弹着门农雕像汇成的天国的音乐在他耳边回响；音乐轻拍着他，他得到从未有过的歇息，感到莫大的安慰。惨白的怀疑逃到远方，生命盛开幸福和希望之花。（138）

这段叙述富有散文诗的特征，字里行间流露出言说者诗人般的情怀。而这种源自内心的自然的情感正是“机械时代”崇尚算计能力的人所匮乏的。卡莱尔试图从语言层面对陈腐的思想进行革命，他采用的这种富有激情的文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机械时代”人们漠视内心情感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上的激烈批评。这种具有散文诗体的风格在这一章及其他章节中屡见不鲜。这一叙述无视句法的表层逻辑，注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语气慷慨激昂，联想天马行空。在短短的几行语句中使用了比喻、拟人、典故、修辞问句、夸张等多种手法，气势磅礴，极富浪漫主义风格，体现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力。这一散文诗的文体风格令卡莱尔获得了批评家兼诗人的美誉。此后，这种不拘一格的风格在《法国革命》《英雄与英雄崇拜》等著作中会反复出现，成为卡莱尔思想最佳的表现形式。后来，人们专门用 Carlylism 这个词来指“卡

莱尔式的风格”，具体地说是指卡莱尔写作中那种跳跃式的谈话语体，无拘无束、气恢弘宏的不规则的长句，诸多外来词汇（尤其是德语）以及自造新词。总之，虽然“卡莱尔式的风格”的句式有时显得冗长、语言显得晦涩，但这种风格绚丽多彩，充满激情和真诚。马克思对这一风格大加赞赏，他说“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马克思301）。正是这种风格为卡莱尔赢得了一批崇拜者和模仿者，著名的比如有穆勒、萨克雷、艾略特、还有当时年轻的狄更斯等。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卡莱尔式的风格”的“好”或“坏”一直存有争议。有意思的是，小说的最后一章，“编辑”先是对小说的风格做了一番严肃的批评，他说：“先不要说思想，这种大杂烩式的繁复而比喻过度的写作风格，若是这种风格为我们文人所普遍使用，那该是什么样的结果呀！”（273）但是，紧接着，他又问了一个关于小说叙事风格的有趣的问题并要求读者做出回答：“然而，问题又回到我们这里：洞察力偶尔也有很敏锐的人，有敏锐的得体感，又有要真正交流的思想，怎么能用一种非常接近荒谬的形态把这些思想散播出去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比本编辑更聪明的人，应该做出更满意的回答”（273-274）。显然，在这里读者被戏称为比编辑“更聪明的人”，读者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卡莱尔为什么会使用这种曲折的、拼贴的“接近荒谬的形态”来把“这些思想散播出去”？直接明了的叙事方式难道不能更有效地传达这些思想吗？

其实，“编辑”本人对托尔夫斯德吕克讲故事的风格早就替读者做了质询，在“持久的肯定”一章中，他对故事的曲折和语言的晦涩别有一番感慨：

奇异的托尔夫斯德吕克，要是你用平白的语言讲述你奇特的故事，那会多好啊！可是在那些纸堆里，找这样的故事，那是徒劳。只有影射、暗讽、怪异的比喻，行文模模糊糊、捉摸不透……这些时代已经如此龌龊，亵渎神明，为什么还要用不必要的晦涩，隐而不说，或说东说西，使问题复杂化呢？我们的教授不仅神秘，而且古怪；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醉心于明快晦涩交替使用，令人眼花缭乱。这里传递出的真相真情，只有不断窥视才能得知，我们的有才华的读者必须自己做出努力，把这些结合起来。（173）

由是观之，卡莱尔具有诗人般的痛苦，他像诗人一样要跟语言做斗争，像诗人一样难于表达出那些“不可名状的事物”，也即事物的真相或世界的真谛。他觉得日常生活的语言已经被亵渎，变得平庸不堪，所以需要通过诗意化的语言来传递人们心中那“神圣而又神圣的灵魂中的活动”，来表达对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的感知。同时，这段话也暗示，在卡莱尔看来，读者对他的超验主义思想的了解需要借助某种神秘、复杂的方式感知。编辑在这

里再次把“有才华的读者”纳入他的称呼对象，进一步凸显了小说的自主性、自省性或者说自我意识性等特征。卡莱尔本人曾就他为何要选择这一体裁来写作有过辩解。他的好友爱默生和穆勒都曾就《拼凑的裁缝》的叙事风格问题与卡莱尔进行过讨论。爱默生曾质疑托尔夫斯德吕克式的幽默和语言风格是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对此，卡莱尔回答说：“我没有预设的读者，天底下我独自一人，对着友好的或不友好的空间发话。我还想说，对于我认为可以质疑的、不确定的观点我并不辩护，只有在那些疯狂的时候我才能顺利地命中最佳的思想”（Carlyle, *The Correspondence* 98）。穆勒在写给卡莱尔的信中也表达了对《拼凑的裁缝》的语言风格的不解，称卡莱尔的“写作模式，介于讽刺或反讽和严肃之间……难道直接的表述不会一样或更好吗？还有你的遣词造句，我也对此表示怀疑”（Carlyle, *Collected Letters*, vi. 448-449）。对此，卡莱尔是这样答复的：“你对我的风格的评论是正确的……我自己也经常想这个问题，并终于明白了我一直以来想不通的道理。反讽是一种利器，若使用不当就会伤及自己。我无法证明，然而却可以解释近来我何以经常采用这种风格：这是我惊世骇俗的对世界的立场，——或者说，你也可以认为是我特殊的不可理喻的性情”（*Collected Letters*, vi. 448-449）。

卡莱尔的这一解释不禁让我们想到 19 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英国小说家的艰难处境。这个时期，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占上风，在讲究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时代，作家的写作语言也变得理性化、科学化和逻辑化，人们的想象力和直觉感受力受到主流思想的压制，为冲破僵化的思想和风格的藩篱，不少作家试图寻求新的写作之路。历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在评价这一时期的作家时就指出，作为诗人和浪漫主义的预言家注定是要孤独的。在麦考莱看来，在现代社会中诗的本真只能是“疯狂之真”，需要“某种程度的天真，而这份天真相当于理性的间隙狂乱”，他接着指出：“一个文人，若想成为一个诗人，必先成为一个孩子。他必须撕破思维之网，必须抛弃那些可能赋予他权威感的大多数知识”（Macaulay 5）。

卡莱尔就是那个天真的孩子，他拥有孩童时代的那份好奇心、直觉以及内在感受力，他打破常规以富有诗意的叙述方式试图阐释他所理解的世界现象背后的本质。《拼凑的裁缝》中小说主人公的孤独实际上是作者内心孤独迷惘的表露。卡莱尔自己坚持认为他的语言风格是自然的，并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他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他父亲本人说话时言简意赅但又不乏激情，这一特点在卡莱尔身上继承下来了。但是，事实上，《拼凑的裁缝》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确实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也许我们不能单纯地就作品的风格做出“好”或“坏”这一非此即彼的判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卡莱尔创造了一种特别符合自己的表现自我的文学方式，这一风格无拘无束，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卡莱尔相信“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这一理念是其激进的艺术实践的

基础。在卡莱尔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实验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时代的忧虑甚至“绝望”。在主题上，《拼凑的裁缝》的前半部分，尤其是“持久的否定”一章，明显流露出作者深深的忧虑和绝望心态。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文化分析中心”主任乔治·莱文（George Levine）看来，这足以表明《拼凑的裁缝》是从浪漫主义文学向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过渡的标志，因为这部小说“将绝望纳入了创作的中心视野，而这一主题在浪漫主义时期并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Levine 153-154）。莱文还进一步指出，卡莱尔不可能依靠《拼凑的裁缝》这部作品来确立自己作为时代圣哲的地位，因为在这部书中他依然“局限于把人物经历视为一个面对显性的敌意世界的个人内心感受”（Levine 153-154）。如果卡莱尔想在维多利亚社会中确认自己预言家的身份，他就必须突破这个限制。所以，《拼凑的裁缝》是卡莱尔完成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虚构作品，从此他不再“朝内看”，而是目光朝外投入到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写作之中，并最终在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叙事中确立的“切尔西的圣哲”的地位。

结语

卡莱尔在 1835 年和 1937 年波士顿出版的《拼凑的裁缝》的序言中借用“编辑”的话为自己的语言风格做了辩解，他说：“用华丽的外衣包着自己的思想……用离奇有趣、滑稽夸张的风格，去表达对最严肃话题的最严肃的思考，这是他的脾气……我们相信：此书风格真诚，用地道的英语写成，同样流露出作者掌握了语言所有的丰富资源”（《拼凑的裁缝》附录 IV，新英格兰的编辑 284）。今天看来，《拼凑的裁缝》堪称为维多利亚时期文化思想领域的发轫之作，也是所有 19 世纪英国圣哲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卡莱尔的全部思想，书中可以看卡莱尔对“机械时代”功利主义和唯理主义的批评、对以宗教作为精神支柱的社会结构的推崇、对工作和责任的道德律令的呼唤、对具有道德力量的英雄的渴望、对维多利亚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的关切以及对科技进步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焦虑，当然，还有他详细阐述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哲学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变化过程。《拼凑的裁缝》是今天我们了解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作品。乔治·艾略特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身居显要之士还是思想敏捷之士，几乎鲜有未受卡莱尔影响者……其影响的特征突出的体现便是，哪怕是对许多根本就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来说，正是阅读《拼凑的裁缝》成了他们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纪元”（Eliot 213-14）。

总之，《拼凑的裁缝》是一个思想和风格的大熔炉。在文体上，集欧洲文学大家诸如拉伯雷、塞万提斯、让-保罗等讽刺大家的风格为一体，同时又吸纳了英国喜剧幽默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和斯特恩的独特叙事方式；在思想上，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的衣钵，演绎出所谓的“衣裳哲学”，

由此出发提出了“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这一先验主义思想，并以此作为对英国社会问题进行批评的武器。

【 Works Cited 】

- 阿·勒·凯内：《卡莱尔》，段忠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A.L.Le Quesne. *Carlyle*. Trans. Duan Qiaozho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7.]
- Carlyle, Thomas. *Sartor Resartus*. Ed. K. McSweeney & P. Sabor. Oxford: OUP, 1987.
- . *The Correspondence of Emerson and Carlyle*, ed. J. Slater, New York: Columbia UP, 1964.
- Carlyle, Thomas & Jane Welsh Carlyle. *Collected Letters and Jane Welsh Carlyle*. Ed. C.R. Sanders et al. Durham: Duke UP, 1970.
- . *The Works of Thomas Carlyle*, Centenary Edition, ed. H.D. Trail, 30 vol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96-1899.
- 卡莱尔：《拼凑的裁缝》，马秋武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Carlyle, Thomas. *Sartor Resartus*. Trans. Ma Qiuwu.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4.]
- Eliot, G. *Essays of George Eliot*. Ed. T. Pinne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 Harrold, C.F. *Carlyle and German Thought: 1819-1834*. New Haven: YUP, 1934.
- Johnson, Samuel. *The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A Selection*. Oxford: OUP, 2009.
- Levine, George. ‘*Sartor Resartus* and the Balance of Fiction.’ *Victorian Studies*, viii(1964)2: 131-160.
- 劳伦斯·斯特恩：《项狄传》，蒲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Stein, Lawrence.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Trans. Pu Long. Nanjing: Yiling Press, 2006.]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I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Marx, Karl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1.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56.]
- Macaulay, T.B.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4.
- McSweeney, K.&P. Sabor. “Introduction” to *Sartor Resartus*. Oxford: OUP, 1987. pp.vii-xxxiii.
- 斯威夫特：《木桶的故事》，主万、张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Swift, Jonathon. *A Tale of a Tub*. Trans. Zhu Wan, Zhang J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0.]
- ：《格利佛游记》，张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 . *Gulliver’s Travels*. Trans. Zhang Ji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0.]
- 威廉·亨利·赫德森：《拼凑的裁缝》导言。卡莱尔：《拼凑的裁缝》，马秋武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Hudson, W.H. Preface to *Sartor Resartus*, in Thomas Carlyle. *Sartor Resartus*. Trans. Ma Qiuwu.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4.]
- 徐晓雯：“‘切尔西的贤哲’托马斯·卡莱尔”，《外国文学》，3（1998）：86-91。

[Xu Xiaowen. “‘The Sage of Chelsea’: Thomas Carlyle.” *Foreign Literature*, 3(1998): 86-91.]

詹姆斯·A. 沃克：《项狄传》序，劳伦斯·斯特恩，《项狄传》，蒲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1-60。

[Walker, J. A. Preface to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in Lawrence Stein.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Trans. Pu Long. Nanjing: Yiling Press, 2006. 1-60.]

责任编辑：张连桥